中日关系："福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金熙德

内容提要：福田康夫当选日本首相，有着新民族主义思潮回落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及新保守主义政策遭弃等国内政治背景，同时也是其个人魅力和自民党内派系力学发挥作用的结果。福田临危受命，在内政上面临在野党发难、国内改革进退两难、新保守势力掣肘等诸多困难。在外交上，福田有着国际环境、中日关系、对华政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多年未有的新机遇。未来"福田机遇"如何，将取决于福田执政前景和中日关系发展势头。中日都需要重新审视对方和相互关系，抓住机遇，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2007年9月25日，福田康夫当选第91任日本首相。对中日关系而言，这意味着日本诞生了小渊惠三首相以后的又一位温和、务实的领导人。"福田时代"意味着什么，其前景如何？本文拟就此进行分析和展望。

一、"福田时代"的内政背景

福田上台的深层背景，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回落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及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遭弃。

福田上台的深层背景，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回落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及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遭弃。

2001年4月，日本政治的钟摆曾摆向"呼唤强者"的一边，使第三次竞选自民党总裁兼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胜出。小泉原本从不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向海外派兵、质疑日本"人常"运动，可谓一个典型的鸽派议员。但他在此次竞选中却突然打出了"改革无禁区"、"参拜无禁忌"的强硬姿态，竟得到了日本民众和自民党基层党员的狂热追捧。

然而，经过五年半的小泉政治时代，日本各界对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

"差距社会"怨声载道，对其新保守主义的"从美轻亚"外交深感忧虑。[1]政治潮流的改向，促使原本从骨子里信奉新保守主义的安倍晋三暂时收敛了锋芒[2]，在其当选首相后修正了小泉外交路线，成为打破日中僵局的"破冰者"。

小泉与安倍，一个由鸽变鹰，一个由鹰变鸽，两人在日本最高政治舞台上都没有做本色表演，而是都采取了背离其原有理念的举动。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日本政治家在当上首相后，往往要顺应国内政治潮流而修正其行为方式，这种倾向在眼下"大政治家不在"的"舆论政治"环境下更显突出。

如果说安倍的对华"破冰之旅"是一次出色的非本色表演，那么其接下来对内推动"摆脱二战后体制"运动、对外开展以围堵中国为主要目的的"价值观外交"则是其真情表露。

在2007年7月29日举行的第21届参议院选举中，选民对安倍领导的自民党说了"不"，使其自1955年建党以来首次拱手让出了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与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议席相加也未能占据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安倍首相勉强支撑一个多月后，终于身心疲惫，于9月12日中午突然宣布辞职。福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在自民党内九个派别中八个派别的"雪崩"式支持下一举摘取了首相桂冠。[3]

有分析认为，自民党败北主要败在内政问题上，外交因素的负面影响不大。但种种迹象表明，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也遭到了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4]

经过"小泉—安倍"的新保守派占据主流时代，日本政治的钟摆回摆到了"渴求中庸"的一边，大任降在"富有平衡感"的福田身上。

福田上台，也是其个人魅力和自民党内派系力学发挥作用的结果。

福田脱颖而出，靠的是两大特点。

一是政策稳健。福田的座右铭是出自《老子》第58章的格言"光而不耀"，而《论语》第十二章的"和为贵"也是其政治信条，这些确实都符合其低调的处事风格。

二是身世可靠。福田所属"森—町村派"的前身，正是其父福田赳夫所创立的"福田派"，2000年以来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连续三位首相皆出其门下。2006年9月"森—町村派"扶安倍晋三上台，森喜朗一直对福田心怀愧疚。安倍宣布辞职后，森喜朗立即出面说服自民党各派阀领袖接受"福田首相"

1 金熙德："该全面盘点小泉政治了"，载《环球时报》，2006年6月30日。

2 安倍的新保守主义理念，体现在其从政以来在日本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诸多言行以及《致美丽的国家》（文艺春秋，2006年）等著述中。

3 林晓光："福田康夫政权的优势及面临的问题"，载《东北亚学刊》2008年第1期，第7—11页。

4 如2007年3月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指出，组建四国战略同盟"绝非是高明的外交政策"。一些日本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示，反对开展与中国相对抗的"价值观外交"。

方案，渲染“武斗派”麻生太郎出任首相的危害性，指出唯有温和派福田康夫的“太极拳法”才能与在野党抗衡。在自民党的存亡时刻，“森—町村派”推举出各派都能接受的福田，可谓于党、于派皆有利。福田上台，日本政治回到了本色表演时代。

在日本政治的光谱里，福田在组织上属于“森—町村派”，思想上则横跨鹰、鸽两派。

在日本政治的光谱里，福田在组织上属于“森—町村派”，思想上则横跨鹰、鸽两派。福田赞同修宪，但不急于付诸实施；主张制定“向海外派兵”的“永久法”，但采取慎重推进方式；提出日本有权拥有核武器，但不采取核武政策；坚持“日美基轴”路线，但又十分重视亚洲，对中韩姿态友好，对朝政策温和。

福田居于鹰、鸽之间，其地位十分微妙，既可以得到双方认同，也有可能被两者抛弃；其作用非常独特，既可以尝试“新保守派”想做而未能做到的突破，也有望实现温和派无力达成的目标。

除非发生朝野大联合、在野党分裂、执政党下台等异变，朝野分别执掌众参两院牛耳的“拧劲国会”局面在未来三年至九年内都不会发生改变。

然而，《老子》第58章的主题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田临危受命，注定要遭受《孟子·告子下》中所云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困扰，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在其任内把自民党政权断送掉。[1]

福田面对的第一只“拦路虎”，是控制参议院多数议席的在野党。除非发生朝野大联合、在野党分裂、执政党下台等异变，朝野分别执掌众参两院牛耳的“拧劲国会”局面在未来三年至九年内[2]都不会发生改变。福田幸运上台，但其执政前途布满荆棘。

福田遭遇的第二只“拦路虎”，是国内政策的困局。近年来，“贫富差距”、“没有实惠的景气”、“养老金漏记”、“政治资金丑闻”等问题已使日本民众深感厌倦，福田在“改革”上进退两难，束手乏策。而福田的稳健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执政初期，福田因不像小泉、安倍那样极端和张扬而颇得民心。但其后，福田却因未能提出清晰的安民政策而失去民意，使其刚上台时得到的60%以上支持率跌至三个月后的30%出头，即降到了“由福到祸”的临界点。

福田前行路上虎视眈眈的第三只“拦路虎”，是新保守主义势力。2007年10月10日，原首相中曾根康弘在防卫大学演讲时，责难福田不谈修宪和爱国教育，对安倍和麻生的政策理念大加赞赏。这一动向反衬出福田与“新保守派”之间的界线，同时也表明“新保守派”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新保守派”核心人物

1 金熙德：“‘福田丸’在暗礁险滩中穿行”，载《世界知识》，2008年第2期，第30—31页。

2 日本参议院现设242个议席，议员任期六年，每三年改选半数，不得提前进行选举。在现有国会内朝野政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自民党欲改变议席劣势，有待于在2010年、2013年、2016年……的某一次选举中实现翻盘。

"HANA"（以下四人姓名的头一字母：平沼赳夫、麻生太郎、中川昭一、安倍晋三）已成立新的政策研究会，其宗旨是推动实现安倍任首相期间提出的内外政策目标。

二、"福田到来"后的中日转机

与内政上的困境迥然相异，福田在外交上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当前国际环境有利于鸽派，而不利于鹰派。

首先，当前国际环境有利于鸽派，而不利于鹰派。

2001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伊始就高举新保守主义大旗，重用了一大批狂热的新保守派分子，随后一路杀向巴格达。然而，整个美国陷入了越战以来的伊拉克泥沼，新保守派人物纷纷离布什黯然而去。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过新保守主义大旗，倡导构建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在欧亚大陆构筑一道"自由与繁荣之弧"、以日本和印度为核心建立"自由与繁荣之海"和"大亚洲"。但这一"价值观外交"在其国内遭到冷遇，在美、澳、印碰到软钉子，在中国引发了反感。2007年接替安倍充当新保守主义旗手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但她的"人权外交"一开始就遭到了其外长施泰因迈尔、社会民主党主席贝克及国内经济界的严厉批评。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大国领导人相继掀起的三波新保守主义高潮，反映出西方优越论的维护者们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强国发展势头的防御本能心理和预防性攻击意图。但是，这些新保守主义主张在其国内未得民心、在国际社会缺乏知音，特别是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反感，因而目前陷入低潮期。

2001年以来，小泉摆出了向美献媚、对中韩强硬的两种表情，一时间很得美国新保守派的宠爱。但到了2005年，美国目睹了小泉再三"参拜"为二战甲级战犯张目，靖国神社的"游就馆"把太平洋战争的起因归于美国，日本政要不断出来否认当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日本与中、韩、俄等邻国的领土争端出现紧张局势。眼看着日本因这些"历史"与"领土"问题而在西太平洋地区陷入孤立，美国再也坐不住了，终于站出来，开始以委婉的语言接连"敲打"日本，劝其收敛锋芒。日本新保守派失去了来自美国的支持。

中日关系经过十余年调整，进入了冷静审视对方的新阶段。

其次，中日关系经过十余年调整，进入了冷静审视对方的新阶段。

中日关系曾经历四次重新定位：（1）19世纪后期；（2）二战以后；（3）1972年；（4）冷战以后。冷战后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集中表现为两国间围绕一系列问题频频发生摩擦。究其原因，中日关系的基本条件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即美国从"联华制苏"转向"扶日抑华"，日本国内反省侵略历史的势力和思潮衰退，中日两强竞争趋

势日趋明朗，中日民众感情和舆论持续恶化。

在过去的约15年间，中日关系重新定位进程经历了1995—1996年和2001—2006年两次“政冷期”，1997—2000年和2006年10月—2008年两次“回升期”，有了1998年11月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和2006年10月的“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两次双边框架的定位。[1]

2006年10月8—9日，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中日关系避免了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风险，恢复到了小渊执政时期的状态。2007年4月温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中日关系继续在“回暖”轨道上运行。

再次，福田自身的政策取向使中日关系面临多年未有的新机遇。

第一，历史问题有望继续走向软着陆。

安倍在首相任内解开了中日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僵局，却又留下了今后继续参拜的伏笔。福田则在上任之前就明确表示，如自己当选首相，在任内绝不会参拜靖国神社。这就使小泉任首相时给中日关系设置的最大政治障碍得以排除。在福田任内，中日双方有望继续在历史问题上营造“总结过去、走向未来”的良性互动氛围。

第二，台湾问题有望得到更好的处理。

在台湾问题上，福田作为日本领导人首次明确表示了“四不”：日方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不支持“入联公投”。福田在会见记者时，刻意说明了日本的立场是“不支持”，而不是“反对”。尽管“不支持”比“反对”的语气弱，但毕竟表达了日本政府对台独的否定立场。

第三，“价值观外交”进入低潮期。

据日本媒体报道[2]，日本2007年版的《外交蓝皮书》预定在2008年春季发行，麻生太郎任外相时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方针将不会被写入该蓝皮书，因为此外交方针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高村正彦外相挑明了其意图，即他认为不应摆出这种“举刀过头”的咄咄逼人姿态。[3]福田在2007年11月18日播放的美国CNN电视台专访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形成威胁。他说：“我们是否对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感到威胁呢？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也是一样。”

在对中国进行的“迎春之旅”中，福田特意要求给此行增添“文化之旅”色彩，安排其访问仰慕已久的孔子故里。2007年12月30日，福田首相抵达曲阜参观了孔庙。福田说自己“回到了2500年前文化的原点”，不断念出“礼之用，和为贵”等《论语》中的语句，并表示“孔子的儒家思想如能成为常识而在大家心里扎根，世界会变得很和平”。福田的曲阜之行，既是对中日悠久文化交流史的

1 金熙德：“中日关系‘重新定位’问题的探讨”，载《日本学刊》2007年第4期，第5—18页。

2 [日]“消除麻生色彩 外交蓝皮书决定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载《读卖新闻》2007年11月11日。

3 同上。

重温，也是对东亚各国间“共同价值观”的认同。这在福田挥毫题写的“温故创新”一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中日间舆论氛围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

上台伊始，福田首相因其父福田赳夫的良好形象和其本人一贯的对华友好姿态而备受中国各界的关注与期待。对福田而言，推动对华关系成为其建树政绩的最佳领域。30年前，福田赳夫首相提出的“福田主义”成为二战后日本亚洲外交的精华。如今，福田康夫欲继承和发扬其父的亚洲政策，其“新福田主义”是对“小泉—安倍”路线的适度调整、向“福田主义”和“外交三原则”[1]的某种回归以及对日本外交新方向的小心探索。对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而言，“福田新政”远比小泉、安倍乃至麻生的政策更具亲和力。

对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而言，“福田新政”远比小泉、安倍乃至麻生的政策更具亲和力。

第五，中美日关系开始探索共赢框架。

福田首相的强项其实并不在于“亲中”，而在于“平衡美亚”的能力上。福田把美国作为出国亮相的首选地，发出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同时重视与亚洲关系”的政策信号。[2]福田上台之时，正是日美问题多发之际。围绕二战历史问题的摩擦是否重起，新《反恐特别措施法》能否在国会通过，日朝关系与美朝关系能否均衡发展？所有这些都使福田的对美外交举步维艰。2007年11月15—17日，福田首相访问了美国。此访未能解决日美间任何悬案，但福田却在其间提出了“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共鸣”这一新的外交理念。日本一些智囊人物已提出了建立中美日首脑会谈机制的建议。[3]

出任首相以来，福田多次表示希望尽早访华，但却被国内诸多棘手问题拖住。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终于来华访问。福田成功访华，使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中日关系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福田在12月28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风趣地说道：“在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福田到了，就是福到了。”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中日双方已商定，胡锦涛主席将在“樱花盛开”的时节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再度访日，其重要意义和预期成果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胡主席访日期间，中日双方将就

1 1957年日本政府提出的“外交三原则”是：1)以联合国为中心；2)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3)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2 2008年1月30日，福田首相的外交顾问、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教授在中国社科院演讲，披露了福田刚上任时的一段故事。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五百旗头真教授通过电话祝贺福田当选首相，福田请他向美国各界转达：福田的政策是最重视日美同盟，同时也重视与亚洲各国关系。

3 五百旗头真是中美日首脑会谈机制的积极提倡者。另外，2007年12月18日，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研究会发表的题为《对“战略伙伴中国”出现的期待和日本的战略》的建言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建议。近年来，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一些民间智囊机构也提出了建立中美日政府间对话的建议。

前一时期的两国关系进行总结，发表共同文件，就一系列合作项目达成协议。通过胡主席访日，中日两国在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中有望“更上一层楼”。

三、“福田机遇”的未来前景

不管“福田后”自民党内谁继任首相，即使是民主党上台而推举自己的首相，像小泉那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强硬挑战中日关系原则底线的可能性不大。

中日关系的“福田机遇”如何，首先将受到福田首相执政前景的影响。

福田康夫在近几任日本首相中对中国最友好。按常理判断，其执政时间与“福田机遇”的长短是一致的。而其究竟能执政多久，则取决于能否领导自民党打赢一场众议院选举或其内阁得到的支持率能否得到提升。

从另一个角度看，“福田时代”是日本政治演变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还是一个新政治篇章的序曲？“新保守派”从此大势已去，还是经过韬光养晦后将卷土重来？日本政治的常识是“一寸之前是黑暗（谜团）”，下一步的日本政局是个未知数。仅就目前局势看，不管“福田后”自民党内谁继任首相，即使是民主党上台而推举自己的首相，像小泉那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强硬挑战中日关系原则底线的可能性不大。

中日关系能否抓住机遇，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实现从“恢复性发展”向“实质性发展”平稳过渡，是当前“回暖”进程的关键。经过十余年的相互关系调整，中日相互战略摸底时期趋于结束，两国关系的焦点正从历史问题转移到战略问题上来。

从总体上看，中日关系还远没有走到战略和解与合作阶段，其相互防范的战略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近期动向表明，日方对“中日战略互惠”中“战略”一词的理解，与中方心目中的“战略”相去甚远。2007年11月下旬法国总统萨科齐访华刚结束，日本马上对法国推动解禁欧盟对华军售的立场提出了强烈反对。2007年12月17日，日本不顾中国等邻国的忧虑，与美国一道进行了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试验。可见，即使在福田内阁时期，日本也不会放弃继续强化日美军事体制的基本思路。日本心目中的理想态势是：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保持对华优势，在此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对华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提升对华关系来逐渐减少对美依赖。

对中日关系而言，“福田时代”的出现只是日本政治的一次钟摆，还是螺旋式上升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如果是前者，那么福田执政后期或“福田后”首相时期的政治钟摆还可能“向右”回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日本政界和社会

各界的对华认识与态度已不会再回到“小泉政治”时期那样的极端情绪化局面。[1]

中日关系确实迎来了新的转机，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中日要走向战略和解与合作，既要调整相互利益上的矛盾，也要致力于消除情感与心理上的隔阂。中日战略对话如何深化？东海问题如何解决？日本舰艇何时访华？经济高层对话期待哪些进展？民间交流能否再上一个台阶？围绕这些问题，中日首脑互访与会谈将为各领域交流不断排除政治障碍，而各领域交流的健康发展又将为首脑互访与会谈提供日益宽松的回旋余地。

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过去十余年间，日本各界精英和国内舆论的中国观经历了严重不适、激烈对立、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在安倍执政时期，日本掀起了“价值观外交”的高潮。在这一动向的背后，既有一些西方国家强化意识形态外交的国际背景，也有日本试图拼凑意识形态集团来牵制和诱导中国崛起进程的外交思考。近来，日本一些强硬派政治人物对福田首相放弃安倍的“价值观外交”颇有微词。

如何对待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

但一些有识之士则主张，“必须把日美关系和与亚洲的良好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应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2]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发展的目光正在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点。这也是造成小泉失宠、安倍失势、“福田来到”的最新社会潜流，也是令“新保守派”暂时收敛锋芒的现时政治氛围。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发展的目光正在变得更加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点。

21世纪初期，日本进入了新的外交抉择进程，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和中国。在现阶段，日本依然以日美同盟为其外交的“基轴”。日美同盟是一个“美主日从”的框架，日本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同时也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压力。在战略上，美国力图维持“美主日从”框架，日本力图取得“日美对等”地位。在战术上，美国力图促使日本在不突破“美主日从”框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美合作，日本则力图利用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对等伙伴”地位。

---

1 刘江永认为，福田对华政策折射出四大结构性变化：1）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受阻，日本政治发生结构性变化；2）中美日关系出现结构性变化，形成三方同时谋求改善和加强关系的新趋势；3）中日相互依存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日本不能不谋求同一个不断壮大的中国打交道；4）中日之间彼此的定性分析和战略判断发生结构性变化，开始从相互警惕的对立思维转向客观理性的合作思维。（刘江永：“从‘融冰’到‘春暖’——2007年中日关系回顾与展望”，载《亚非纵横》，2008年第1期，第14—17页。）

2 [日]五百旗头真：“21世纪的对美关系——有必要与亚洲外交互动”，载《每日新闻》，2007年11月25日。

就中国方面而言，同样面临着如何看待日本以及怎样为当前和未来中日关系进行战略定位的问题。

回首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各界的日本观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出现了政府、知识精英和民间舆论的一致、分化、再趋同的周期性变化。仅就国内各界的中日关系问题讨论而言，曾先后交替或同时出现了各类观点：在政策优先顺序上，曾出现历史问题优先论、中国台湾问题优先论、领土与海域问题优先论、经贸关系优先论、民间舆论问题优先论、多边框架优先论，等等；从对日对应方式的观点看，相继出现对日强硬论、对日妥协论和软硬兼顾论；在国力判断和民族心理上，则有轻视日本和夸大日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在认识方法上，则可以见到注重感情、呼吁理性、道德批判、战略判断等多种类型。

其实，中国各界的日本观起伏波动的过程，也是中日关系变化规律本身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日关系的演进过程，是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两国间复杂互动的进程。只看到其中某一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的认识和做法，都不可能催生出科学、合理的对日政策思路。随着两国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中日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影响这对关系的变数日益增多，因而仅靠一种渠道或单一方法解决中日间结构性问题变得日益困难。因此，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势必将是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相互影响的曲折、渐进的过程。

综观以上因素，一方面，目前出现的“福田机遇”实属来之不易，应当十分珍惜和充分加以利用。另一方面，中日关系正日益走向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日本首相交替所能产生的影响将继续相对减弱。“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友好。”这一中国领导层反复强调的语句，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